

中国  
文学研究  
年鉴 1986

ZHONGGUO  
WENXUEYANJIU  
NIANJIAN

2006.7.20  
J

ZHONG GUO  
WEN XUE YAN JIU  
NIAN JIAN

1986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工作人员

主 编 吕 林  
副 主 编 赵远帆  
责任编辑 陶国斌  
编 辑 蔡田明  
装帧设计 王 堃

###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6）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华 昌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3.5印张 6插页 1206千字

1988年2月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精）2135册（平）2475册

\*

ISBN 7-5059-0477-9/I·303（平）定价：10.60元

ISBN 7-5059-0478-7/I·303（精）定价：14.60元

# 前 言

何西来

1985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在社会经济变革和文化观念变革的总体背景之下，仿佛突然充满了活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这种进展，虽然在各具体学科之间并不平衡，但从宏观上看，却不难发现一些大体接近的特点：

（一）文艺学方法论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二）文学观念的变革进一步走上自觉；（三）研究角度和研究参照系的多元化趋势变得明显了；（四）宏观性、整体性、规律性的研究在加强；（五）对近几十年来文学研究本身的反思在深化。这五点当然远不是包罗无遗的概括，但却无疑是最重要的。

在文学研究诸学科的很有气势的推进中，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批评是其锋芒所在。文学理论为具体学科的研究提供方向选择的指导原则，提供一般的范畴和方法；当代文学批评则是联结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中介，是纽带与桥梁。前些年，理论批评一直被认为落后于创作。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科学，却也反映出人们希望迅速改变理论批评面貌的焦急心态。到了1985年，以方法论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为驱动力，理论批评一下子跃到文学研究诸学科的前沿。在其带动之下，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和风貌，都正在或将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本年鉴所要勾勒的，就是这一变化的大致轮廓及其所留下的轨迹。

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是文学观念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怎样的文学观念系统，就有怎样的文学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一方面，观念的变动，必然要求方法的更新、丰富与调整；另一方面，方法的更新，也必然会影响观念的变革。因此，不能离开文学观念变革的全局，来孤立地看待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

文学研究方法更新的要求，受这样几方面的因素所推动：首先，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大大地向前突进了。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冲破了许多长期存在的禁区，向现实社会，向丰富多变的人生靠近；在艺术形式、审美趣味、表现技巧上，也出现了多方面的追求，争奇竞新，让人应接不暇。创作实践的突进，提出许多新的问题，要求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给以科学的说明。但

是，原有的一套理论方法不够了，显得僵化、板滞、单调。在飞速发展的创作实践面前，操旧枪法的批评家们深感捉襟见肘，常有力不从心之慨。于是，更新批评方法的要求，就变得相当迫切了。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诸学科中最接近生动的、时刻发展变化着的当代文学创作的部分。向前突进了的创作实践，先是以巨大的冲击力，促使批评方法和批评观念的变化，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然后，变化了的文学批评，又不断把来自创作实践的新鲜经验，提炼、升华为新的理论，引起原有理论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变革。

其次，文学研究方法更新的要求，来自其它非文学学科的冲击。这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或称“第三次浪潮”的冲击。现代科技革命大大地拓展了人类的实践范围，改变着人们头脑中的宇宙图象，因而也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方法。自然科学的进展在最前沿。它的进展推动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某些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变革。西方世界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变革，是过去长期处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知识界很少能感受到的。随着经济上的开放，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文化上的开放与之“配套”、与之相适应。于是，在时高时低的“左”倾喧嚣声中，在“数典忘祖”的叫骂声中，科技革命的大潮，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到中国的大地上来，流入知识界干涸得龟裂了的心田。一些先进的人们，不仅开始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革新自己的方法，而且开始了本学科的改造。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趋时，而是出于对时代要求的自觉。这种自觉，在文学研究界也不乏其人。他们率先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横断学科的方法引进文学理论的探索和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中来，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耗散结构的方法、发生认识论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模糊数学的方法等等。

再次，文学研究方法更新的要求，还来自文学研究诸学科的具体研究实践。一般说，是文学理论指导着文学研究具体学科的学术探讨。理论体系和理论方法的变革，会推动具体学科的研究走上新的阶段，开拓新的学术境界。但是，因为具体学科的研究面对着不同时代、不同方面的文学创作实践，所以它们同样会不断地为理论的发展提供某些刺激，提供经过概括的经验与材料。例如，近几年神话学的深入研究，对于重新分析文学的起源，对于审美发生学的研究等，就都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应该看到，文学研究诸学科在一段很长的时期，是处于人为的封闭状态的，因而缺乏交流，方法单一。到了新时期，这种封闭状态被打破了。无论是相近学科之间的交流，还是与非文学学科的交流，都有所加强。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之后，与国外同行学者的交流增加了。于是，出于同国外学术界对话的需要，尤其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对原先比较单一的研究方法，进行大幅度的补充、更新、调整，使之趋于多元化，便显得十分迫切了。

文学研究方法更新的锋芒，主要是针对了教条主义的倾向。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曾在文化思想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具有强大的惯性与惰力。教条主义不是从研究对象出发、从丰富的文学现象出发，经过科学



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综合，得出与事实相符的结论，而是从一些亘古不变的教条出发，把丰富的文学研究对象砍削、肢解得符合于这些教条，符合于某种先验的原则。近几十年，文学研究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庸俗社会学方法的风行。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也不是科学的社会学方法。它把马克思主义把握社会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简化为几个干巴巴的教条，当作随处可以张贴的标签。在庸俗社会学方法的支配下，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新的规律，导出新的结论，而在于对已知原则和已知结论的演绎和注释。诸多文学现象，不过是演绎的手段和注脚罢了。

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是文学观念变革的主要阻力源，不彻底克服它、抛弃它，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就很难迈开大步，进入更深邃的境界。近些年，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诸学科的进展，从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在不断地克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取得的。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者学术视野的扩大，人们与依旧广泛存在、并且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因此，我以为，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地、切实地开展一场持续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的时候了。这将是一场细致的精神领域的革命。它着眼于建设，着眼于创造，着眼于“立”，而不是“破”字当头。它当然有自己的理论锋芒，但这锋芒不仅向着教条主义者，而且向着开拓者自己身上的教条主义积习。我深信，在新方法的借鉴、消化、创造中，在对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反省和清算中，经过一代、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文学研究，一定会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由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有来自社会变革和文学本身的刺激与推动，又有非常现实的历史针对性，所以很快形成了热潮。本年度，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变成了文艺理论界的“时髦”学问，四海向风，争相谈论。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重要的、有影响的专题研讨会就有厦门会议，扬州会议和武汉会议三次。流风所及，即使在一些具体学科的学术讨论会上，人们也争谈研究方法的更新；至于出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那就更多了，以致人们戏称1985年为“方法年”。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形成了谈论的热潮，但人们对新方法的引进与提倡，对于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趋势，在态度上却差异很大：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勇往直前，有的疑虑重重；有的以为看到了曙光，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践，有的则以为洪水猛兽将至，忙于防范……就拿几次方法论的专题讨论会来说，会议的基调和方向就不大一样，落差较大。在一种新的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是正常的，不足为怪。

虽说出现了“方法热”，但见诸报刊的文章却多数是较为一般的介绍，真正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之后提出的见解并不多。新方法的介绍、宣传、讨论，是必要的，有利于形成一种气氛；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要用来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否则，是很难站得住的。应该说，不少新方法的提倡者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少数先进者还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上，人们较多地注目于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

论，谓之“三论”。林兴宅运用系统论方法研究阿Q的性格系统，研究艺术鉴赏中的魅力问题；黄海澄运用控制论的方法对于一些基本美学范畴的重新考察；陈辽对文艺信息学的探讨；杨春时系统论美学的研究等，都是在这方面有一定影响的试验。还有其它自然科学和交叉学科的方法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如鲁枢元运用现代心理学方法来建立他的新一代文艺心理学体系所做的探索；丁宁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对文学创作和鉴赏的审视；周宪等对文学研究数学化问题的探讨和对国外文学研究中数量统计方法，数学模型方法的介绍等。还有的学者并不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杂取种种方法，拿来为我所用。什么方法合适，就用什么方法。刘再复研究人物性格内在结构的系列论文，肖兵治中国神话学和古代文学，就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年度的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重视与强调。用这种方法进行各种文学现象研究的论文数量比较多，成绩也较为显著。如钱锺书增改重新发表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应该说是比较方法的力作，比较的方面涉及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比较的材料包括了中国和外国。比较方法不是新方法，比较文学也不是新学科，但它的受到重视却与人们学术视野的走向开放，不无关系。法无定规，它是达到研究目的的手段，既受研究者个人才性的制约，也受研究对象的制约。传统治学方法中仍然有合理性的东西，要发扬；再加上现代科学方法的引进，二者结合，大约是真正的出路。

在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引进中，势必产生这些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关联着研究方法更新的方向。本年度，就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说明了人们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吸收自然科学和其它人文科学的方法于文学研究的实践，不是为了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为了丰富它，发展它。马克思主义只能指导而不能代替具体学科的具体方法。把指导理解为代替，曾是学术界在方法论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弊端。因此，在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中，一定要防止这种弊端再发生，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新方法的多元引进对立起来，甚至划地为牢，束缚创新者的手足，以致窒息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

## 二

看起来，文艺学方法论的探讨，好象是作了文学观念变革的前导，以致人们在戏称1985年度为“方法年”的同时，也曾预断1986年将是“观念年”。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文学观念是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文学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总看法。它包括了文学的各个方面，构成观点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必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积累起来，便形成文学观念的总体变迁。在比较平静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观念变化缓慢，呈现出某种稳定性。但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社会生活变化很快，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观念，文化观念也都处于急速的变动和大幅度的调整之中，这时一般就会发生文学观念的变革。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因而我们的文学观念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事实上,文学观念的变革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就开始了。当时叫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所谓“正”,是对曾经猖獗一时的极左观念而说的,并不意味着完全向某种早已存在的“本”和“源”回复。不是简单地回到五十年代,而是在表面的回复中实现着发展。因为在“文革”中走向极端的“左”倾的荒谬,并非在一个早晨突然从天而降。它的某些因素,某些早期的征兆,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包含在人们的文学观念中了。例如,“文革”中出现的“斗走资派”的文艺,就与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不无某种内在的发展关系。因此,对于以“斗走资派”为主题的“阴谋文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就不能不导致理论界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命题作出新的评价。改变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对文艺的功能观念的重大调整。它说明,人们已不再把文艺仅仅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了,而是开始把它的特性,它的功能视为多元因素组合而成的有机系统。这已经是文学观念的带有根本性的变革了。除此之外,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要论争,早期如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关于新诗潮崛起的论争,近期如关于“寻根”问题的论争,理论上关于现实主义、关于真实性、关于现代派、关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等等的论争,都无不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文学观念的变革。

文学观念具有两重性的品格。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实践的反映,它只有贴近变动不居的生活和创作,并不断据此调整自己的步伐,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成为真正的观念。这是它的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观念一经形成,特别是当它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构成体系的时候,就总想把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囊括到自己的框架中加以解释。这就很难避免削足适履的偏颇。更有甚者,则从既定的原则出发,而否定一切新出现的它所容纳不了的文学现象,把一切开拓和创新,都视为异端。这又是观念的保守性的一面。中国封建时代的某些文学观念的稳定性和超稳定性,就是这种保守性的典型表现。在通常情况下,文学观念变化不大,这时稳定性就显示得比较充分;在变革的情况下,文学观念变动幅度较大,这时革命性就显示得比较充分。因为观念总是存在于具体的人的头脑里,所以观念的新旧冲突,固然可以表现于某一个理论家的内心世界,形成他思想中的矛盾运动,最终实现他的理论系统的蜕变,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表现为坚持旧观念和代表新观念的理论家之间的外部争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文学观念变革,既表现为理论家的内心冲突,也表现为守旧者和革新者之间的外部冲突。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虽然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并且迈出了一些坚实的,幅度较大的步子,但是人们并没有把这些变化纳入文学观念变革的总体结构中加以理解,在这方面也缺乏更为宏观的战略构想。就是说,当时理论界对文学观念变革的自觉意识并不强烈。变革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强化和自觉,是1984—1985年才变得明显的。它的标志是“方法论热”的出现。某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学观念变革的全局来说,只能算是局部。但如果提到方法论的高度,从总体上来看待多种科学方法的引进,却不能不说是关乎



全局的问题。方法，是工具，是手段，是某种考察程序、思维方式和审视角度。特别是自然科学方法，谁都可以用，你总不能随便给加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吧。这里比较安全，风险较小，所以成了文学观念进一步变革的突破口。虽然也有人站出来划框框，定调子，处处设防，企图把方法的更新纳入旧的轨道，唯恐乱了祖宗成法，然而，毕竟挡不住由方法论的探讨而引起的文学观念变革的自觉。

1985年，各省市陆续办起了为数众多的专门文艺理论评论刊物。年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在西安召开了文艺理论刊物会议。据统计，单是公开发行的这类刊物即高达三十种左右，加上内部发行的刊物，数字恐怕还要加一番。这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理论刊物的大量涌现，说明了人们理论兴趣的高涨，而理论兴趣的普遍高涨又反映了社会的理论需要。理论兴趣的高涨，不仅出现在文艺界，也出现在其它各界。这是社会变革深化过程中一种非常重要，非常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历史在它艰难的前进中，总是不断地根据各种已经成熟了的条件，把自己的需要提到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家的面前，并通过他们的头脑，化为理论的语言和论证，引起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实现预定的目标。1985年，我们国家在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并初步站稳脚跟之后，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看来，人们对于改革，以及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并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人振奋，也有人惊疑和惶惑。于是，从理论上论证变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合理性，从理论上把握变革的进程与态势，从理论上预测变革的前程和方向，并以此增强整个民族对于改革的自觉性和心理承受力，开始变得迫切了、尖锐了、刻不容缓了。人们普遍的理论热情，就是这样被呼唤到历史的前台，并逐渐高涨的。历史呼唤着理论家。它为大理论家的出现，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提供了挑战与机会。这在文学领域也是一样。因此，应该把文学理论兴趣的高涨，如实地看做整个社会理论情绪高涨的一部分。这种高涨，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不是出于怀旧，不是面向过去，不要重复老调，而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创造，意在谱写新曲。它的核心就是文学观念变革的自觉。应该说，理论的自觉和文学观念变革的自觉，是在1985年度同时到来的。

历史是人创造的，变革要靠具有变革意识的人把它一步步推向前进。文学是人学，以人为描写中心和研究中心。在按照改革和改革之后社会结构的要求，重新建造人的灵魂的伟大工程中，文学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这就决定了在文学观念的变革中，人们关注的头一个问题，只能是人的问题，他们理论探索的聚光点，也始终追踪着这个问题。

本年度刘再复的理论探索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继1984年写成《性格组合论》的系列论文之后，他依然紧盯着人的问题进行思考。七月，他在《文汇报》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章，引起了文学研究界的注意，《文汇报》就此组织了讨论和争鸣。如果说他的《性格组合论》主要描准了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人，那么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里，

他则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批评家、读者。在这篇文章中，他正式提出了文学主体性的命题，并把它区分为对象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范畴。这篇文章很象一个论纲。在这个基础上，他写成了《论文学主体性》的长篇论文，从本年《文学评论》第六期开始连载。这篇文章对文学主体性的三个范畴逐次作了展开，大致上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总的理论构架。这篇文章不以细致周密的论证见长，有的范畴还可以进一步推敲，需要进一步完善，甚至反对者很容易抓住某些疏漏之处大做文章，然而，这一切都无碍于它在新时期文艺理论史上的价值。它以宏阔的气势胜，表现了一个理论家的难得的敏锐和见识。你不能不惊异于他用理论语言迅速捕捉历史运动的脉搏的能力，那里面跃动着的是火热的心，是滚烫的情感，是一代知识分子燃烧着的使命意识。这是一篇用大斧劈出来的文章，不必用精雕细刻的尺度去轻率地否定它。照我看，即使立论上的某些偏执，不难找到历史的说明。

文学主体性的问题，象哲学上的主体性问题一样，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千百年来一直为不同时代的理论家所思考。他们各自根据自己时代的条件，对这个问题做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说明。文学主体性在今天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针对性。它是对我国文艺理论长期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的补正，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哲学化的提法。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它远接五十年代巴人、钱谷融的受挫了的探索，近接前两年革命人道主义风波叠起的探索；从我国文艺理论长期忽略了的作家的主动性的角度来说，它又是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发展。如果把刘再复的《论文学主体性》与他本年度发表在《读书》二、三期上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结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他是对新时期的文学研究进行了宏观的、全局性的考察之后，才提出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应该说，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抓住了文学观念变革的纲纪。这大约是《论主体性》发表后，能够如巨石投潭激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文学观念变革涉及广泛的理论领域，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主体性问题。为了推动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评论》专门开辟了“我的文学观”专栏。这个专栏发表的孙绍振、刘心武、鲁枢元等人的文章，以其新颖的角度和观点，得到了文艺界相当多的人的好评。这也说明人们对文学观念变革的关心。

理论史表明，文学观念的变革往往会伴随着激烈的论争，这是客观的规律，想要避免也不可能。我深信，新的观念将在论争中使自己不断完善起来，并走上成熟，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旧的观念则将在论争中被证明已经过时，并逐渐被人们放弃，退出舞台。未来是属于革新者的。

### 三

文学研究诸学科的研究实践，把需要变革的信息传递给文学理论，使文学观念变革以自觉的理论形态进行，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而理论化、系统化了的文学观念变革，又把已经取得的某些成果交回具体学科研究中去，推动学科研究的发展，从而形成交叉回旋的相互影响，形成从理论到实践，又

从实践到理论的双向运动。

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文学观念的变革，逐渐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开始从原先单一、僵化、陈旧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特别是系统论方法被引进文学研究领域之后，人们不再把文学现象仅仅看做是政治和经济的简单摹写或反映；文学作品在研究者头脑中的图象，不再是线性的，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它的构成因素是多元的，它的内在结构是多层次的，呈网络状联系的，是有机的。而经过作家头脑加工以后进入作品的政治、经济因素，只是作品内容的一部分，是多元中的一元或数元，而决不是全部。对于研究对象的这种认识，使得一些革新意识比较强的研究者，能够不囿于传统的路子，而选择一些新的角度，新的着眼点来考察文学现象。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就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些新的研究角度的评价。他对近些年文学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作了四点概括：（一）由外到内；（二）由一到多；（三）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四）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加上他在文章开头讲的由破到立，应该是五点。他后来又补充了两点：由静态到动态；由物到人。这些对文学研究的大趋势的概括，虽然着眼于研究方法，其实大都涉及文学观念的变革，包含了研究角度的变化与调整。

刘再复所谈到的上述趋势，在1985年的文学研究中大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变得更明显、更突出了。

美学是新时期的热门学问，本年度，势头依旧不衰。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问世了。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继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之后，又出版了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部门美学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技术美学的提倡与介绍为社会所关注，并且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技术美学》；在文艺美学方面，吴功正的《小说美学》，王世德的《文艺美学论集》等著作也都是值得注意的成果。从美学角度出发，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更大。

心理学角度的文学研究沿着两个方向深化。理论的方向和具体学科的方向。表现在理论上，是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从一般心理学范畴、规律的移植与套用，发展到真正开始从文学创作和鉴赏中提取特殊的心理活动规律。鲁枢元的论文《用心理学眼光看文学》和专题论著《创作心理研究》应当算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是从心理学角度所进行的美学研究，也可以算是文艺心理学著作。此外还有另外一些研究者发表论文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探讨，其中鉴赏心理学的研究较为突出。在具体学科的研究中，人们则更加注意通过作品，研究人物心理和创作主体的心理。以当代文学研究为例，冯能保的《改革者形象的道德审美心理流向》，宋永毅的《当代小说中的性心理学》，都是从这个角度落墨的。在中国古代的文论研究中，也已经有了从心理学角度的思考，如张文勋的《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精神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瑰丽多姿、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角度，有利

于揭示这个广阔深邃的“内宇宙”在艺术创造和艺术接受中的规律。

无论是当代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的研究,社会学的角度依然是许多学者用力较勤的方向。此外,伦理学的角度,历史学的角度,宗教学的角度,也都有研究成果问世。然而,本年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学的研究角度。人类文化学在国际上是一门显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又包括许多分支,如民族志,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等。在我国,文化学和文化史的研究,自从五十年代梁漱溟、吴文藻等被批判之后,虽然不能说已成“绝学”,至少已很少有人问津了。近年来,学术界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反思,出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战略构想的需要,出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际要求,产生了对文化问题的浓厚兴趣。国外的文化人类学介绍进来了,各个学科都在思考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侧重于肯定者,有之;侧重于否定者,有之;两端持平者,亦有之。象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则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对传统文化重新评价,重新思考的成书。重新评价,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反省。这种反省,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象“五四”运动一样,中国的文化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折,新的调整,无论是从消化与改造引进的他民族的文化思想材料来说,还是从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格局,塑造新的民族文化性格来说,都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省。通过这样的反省,做出理性的估价,确定哪些是应予保留的和发扬的,哪些是应予淘汰的和消除的。在文学领域,“寻根”问题的讨论就多少表现了这样的反省。表面看来,1985年文学创作上的“寻根热”来自国外,特别是拉丁美洲文学的启示,实际上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必然会有趋势。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是一种反省;从“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更把这种反省从批判政治的误入歧途,控诉个人的悲剧命运。引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思。“寻根”者的理论也许是浅薄的,但“寻根”的作品却有不少是深刻的,如郑义的《远村》、《老井》。有些作品,很难划入寻根的潮流,但却确实有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陆文夫的《井》,王安忆的《小鲍庄》,还有贾平凹的一些作品。不同的是,这些作品着眼点不同,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否定的程度和方面也不同。照我看,文化的反省是一种历史意识,从总体上说,是积极因素。

表现在文学研究诸学科的具体研究实践中,文化学的角度被人们所接受,所采用,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广义的文化包括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设施与制度。还有其它一些界说。但是无论取那种界说,文化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系统。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无论是把具体作品、具体流派或思潮看作是多种文化因素的复合体,还是把文化背景作为多元的研究参照系,都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这对改变原来单一的对作品的政治分析和单一的政治经济参照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某些过去由于政治评价而一直被否定的作家作品,或一直作为学术禁区无人涉足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从别的角度进行评价的肯定性研究。如本年度近代文学研究中对曾国藩的评价,对中、后期桐城派的评价等。关爱和的《桐城派

的中兴、改造与复归》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文章把曾国藩从反动政治立场出发的主观意图同他的文学主张、文学活动，作了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了他在中兴、改造桐城派方面的贡献，以及他的文论中的某些合理的东西。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如对于周作人的评价，对于胡适的评价，也属于这种情况。陈平原的《林语堂与中西文化》则是从文化角度，特别是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林语堂的文学活动的好文章。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视角拓宽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使他们比较容易发现原先的研究道路的局限，从而有可能进行学术上的反省，把研究向新的阶段推进。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富仁的博士学位论文《〈呐喊〉〈彷徨〉综论》。这篇论文向一种长期被肯定的鲁迅研究的单一的政治化模式提出了挑战，主张从更广阔的文化思想角度全面地评价鲁迅。它既包含了对以往研究道路的深沉反省，又有气势磅礴的推进。这就不能不给整个鲁迅研究的学科带来震动，带来新机。

文化的反省，传统的反省，个人和学科的研究道路的反省，是变革时期一种深刻的历史现象和精神特点。为了前进，不能不反省。一个不能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民族；一种不能反省的文化，是没有出息的文化；一种不会反省的性格，只能象阿Q那样，在精神胜利的自我陶醉中稀里糊涂被绑去“大团圆”。反省可以使人惊醒，可以使这之后的前进更沉着，更坚定，更有力。整个文学观念的变革和具体学科的改造、建设，正是在悲壮的反省中探寻前进的通路的。

#### 四

宏观性、整体性、规律性研究的加强，是1985年文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刘再复所讲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趋势，指的就是这一特点。但他在文章中所描述的，主要还是前几年人们对这种研究的呼吁，具体的研究成果却不多。本年度，人们的热情呼吁开始沉静下来，进而转入了切切实实的研究实践，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成果。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是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学评论，都主要限于单个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就连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也都是许多单个作家作品分析评价的机械拼合。从中很难看出文学发展流变的丰富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这是因为，单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把文学历史发展的多样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蒸发到只剩下政治，只剩下被无限膨胀了的阶级斗争。仿佛文学的规律，就是政治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此外，一无所有。实际上，这就是不承认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这是一种可怕的非科学的偏见。在这种偏见的禁锢与支配下，文学只不过是政治的文学分店，文学研究因而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研究者至多不过象转笼中的松鼠一样，它的生命力全部消耗在无意义、无进展的周而复始的原地转动之中。如果这也叫运动，那也只不过是锁闭的圆环中的运动。

文学研究者早就想冲破这囚禁思想、囚禁肉体 and 灵魂的松鼠转笼式的狭

小天地了。一旦打开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长枷，不再把为政治服务看得至高无上，文学现象的丰富多彩的性质，便开始展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一种不可抗拒的科学诱惑，一种如火如荼的求知的渴望，推动他们去探索属于文学本身的规律。本来，文学是多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所构成的审美复合体，支配着它的发展的规律，怎么可能是单一的呢？过去不是没有人朝这个方向想过，但那下场多半是很不妙的。等着他们的不仅有“打垮人格”的政治批判，而且有铁窗。人们说，为了对付“敌对思想”，无非是“杀、关、管、放”嘛！“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为了妻子儿女，身家性命，研究者们只好对于能够自由翱翔的学术思想，作严厉的自我禁锢，除了被认可、被允许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之外，谁也不指望去探寻什么新的文学的规律了。只是在外来的和内在的思想禁锢被打破之后，创造型的学术思维，才能渐渐长出翅膀，作奋飞远翔的考虑。只有到了这样的時候，宏观性、整体性、规律性的文学研究，才有条件被提出来，才有可能在对以往经验的反复咀嚼与反思中，变成研究者的自觉，并付诸实践。

为了抽绎和概括新的文学发展规律和文学现象的内部结构规律，必须有宏观的、整体的审视角度。这种研究角度不是囿于一隅、坐井观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放开学术眼界，把具体的研究对象放在文学的总系统、文化的总系统、社会的总系统，乃至整个历史的总系统中进行观照与思索。这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开放意识与系统意识。在文学史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鲁迅的《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等都是宏观研究的经典作品。在新时期，较早出现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则是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宏观把握。这本书在学术界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宏观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也可以是一个流派的文学，还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作家或作品入手，剖开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宏观断面。

本年度宏观的文学研究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概括：（一）特定角度的宏观研究；（二）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三）中西文化比较角度的宏观研究；（四）思潮流派性的宏观研究。

所谓特定角度的宏观研究，是指从一定的问题、方面出发，对作家作品作群体性的考察，从中抽象出某种共同的规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很有代表性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是一个比政治、比阶级斗争，甚至比道德伦理都要更广泛得多的特定文化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对新时期的有关的小說创作，作了主题思想上的梳理，进行了气派宏大的逻辑的、历史的、动态的和静态的研究。不是说，文章的每一个结论都无懈可击，但确实能够从中看出这位女性研究者很强的理论思辨能力。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陈思和的《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是从现代文化的特定角度和特定背景下来考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孟悦的《视角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选择的是一个形式角度。所谓视角，其实是指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角度。由于视角的交换，小说描写的内容与侧重点也不一样了。这篇文章正是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艺术角度，描述、分析五四小说的变



迁和现代化的。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钱仲联的《清代学风和清代诗风的关系》，从清代学风变迁的文化背景出发，论述了它对诗风的影响和清代诗歌的一些特点。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是从史学对文学的渗透，从历史记载与文学的描写中，搜集有关的社会文化史料，研究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各种心态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篇自序不仅阐明了《唐代科举与文学》这本书的立意和研究方法，而且本身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写作的，就是特定角度的宏观考察。特定角度的宏观考察，有利于弄清文学研究中一些专门的问题，有利于总结某些特殊的规律，从而把文学研究引向深入。

整体性的宏观研究，看起来很象是一些特殊角度的宏观研究的综合，是小系统的宏观研究向更大的系统的升华，从而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文学”》就是意在把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的。在纵向上，这篇文章沟通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分期，并且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放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古国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在横向上，作者又把他们的描述对象放在本世纪世界文学的大系统中进行把握。虽然这篇文章的某些具体论点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还存在着争论，但这种开阔的思路，把握问题的器度，敢于提出新见的勇气，都是值得称许的。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作整体性探讨的重要收获。但陈文的整体观念更侧重于纵向。从这样的整体观念出发，他把现代文学作了六个层次、三个阶段的划分。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牟世金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现状之我见》，陈良运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等也都可以看作整体性的宏观研究，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宏观研究，在本年度的文学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象比较文学一样，属于比较历史科学的范畴，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和评价民族文化的特点，为了更好地选择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比较研究是绝对必要的。比较，并不仅仅是为了存异，更重要的是为了求同。钱钟书先生的比较研究，就主要着眼于后一点，因而他就能发现中西文化的许多共同规律。近些年来，文化上的开放，使得文学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从而更自觉地探寻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系统中的位置。从本年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近、现代文学学科。有代表性的如王富仁的《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这篇文章分析了现代文学的三个十年。这三个十年都是在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联系中被考察的。作者把现代文学的历史看作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的历史。作者高度肯定了西方现代文化观念的输入。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总体上的缺点不是“全盘西化”和“兼收并蓄”，而且始终不曾“化”过。这是很值得重视的结论。此外，曾小逸的《论世界文学时代》（该文系《走向世界文学》一书的导言），牛仰山的《欧风东渐对近代文学影响的再探讨》，也都是从中西文化的联系与比较中，考察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的。

思潮流派性的宏观研究，也在本年度呈现出强化的趋势。张志忠的《论

当代文学流派》在当代文学流派的研究上是值的肯定的探索。由于近数十年来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和文化心理环境，文学派流并不发达，始终不曾出现过这种文学现象的较稳定的完备形态，因此，张志忠的研究，主要不是进行钉是钉，铆是铆的切实论证，而是更多地通过某种直觉，通过感应，作粗线条的勾勒与描述。确实被他抓住了许多东西，但也确实有不少并不准确、很难经得起认真推敲的东西。张志忠的老师谢冕的《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是在“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广阔背景之下，为新诗潮的出现，为属于这个潮流的诗人在表现感情和自我方面的倾斜辩护的。轻车熟路，颇见功力。另外，近年来关于“西部文学”的探讨，也大致可以划入流派的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但学术探讨上的建树却不大。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对于江西诗派的探讨，对于桐城派的评价，对于近代文学思潮的分析，都有一定进展。其中，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是一部宏观性的思潮研究专著，它按四大思潮的递变把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可备一说。文学思潮的宏观研究，对于揭示文学本身的发展流变规律和内在沿革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自觉地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看来十分必要。

## 五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本册年鉴编辑方面的有关问题。本册年鉴象往年一样，经过文学所所内研究人员和部分所外专家的努力，费时半年有余，才编辑定稿，以现在这个样子同读者见面。有几点情况需要说明：（一）本册年鉴在编排体例上作了一些调整。为了便于各学科的研究者查考检索，我们将原先单独设立栏目的“重要学术活动”，“论文选辑”，“书评”等，分头按学科归类。当然，这种按学科归类的办法，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也有不尽准确之处，这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只能如此。（二）由于各学科涵盖范围有大小的不同，其研究队伍的素质和研究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加上我们初试这种编纂方式，组织工作上也有缺陷，因此，有的学科专题概况介绍比较详细，有的学科则比较简略，有的学科有书评，有的学科则没有。这样，在版面安排和分量上，就显得不那么匀称。今后，我们将在这方面尽可能作些改进，希望多数学科能够大致匀称。当然，要完全作到这样，也不可能。（三）本册年鉴在资料的内容上新增加了1920—1985年文艺理论译著书目。希望它们能在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中，为读者提供某些思考的线索与材料。（四）由于年鉴印刷出版周期过长，我们取消了专家“笔谈”一栏。今后要不要恢复，将视出版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本年鉴的编辑工作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改进之处，诚恳地希望得到专家、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1986.7.23

##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何西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信	王俊年	王善忠	甘 粹
祁连休	吕 林	许觉民	沈玉成
何西来	徐公持	袁良骏	董乃斌
蒋守谦	樊 骏		